

个国家拥有许许多多试错主体和空间，成功的概率自然更高。

对此，萧功秦进一步解释道，虽然戊戌变法时期出现了一批来自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这批人也一度担任了改革大任。但是他们是基于一种特殊机遇快速进入到权力中心，而缺乏最基本的官僚体制政治经验。

至于金融层面，生产发展、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之间的矛盾，同样长期没有得到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统治阶层始终没有成功发行国家主权货币，反而自明代开始一直通过进口美洲白银来解决货币短缺。这一问题没解决，后果便是清朝末期的国家命运将逐步由国内豪商与外国资本支配。

所以当人们追溯清朝末期的改革与变法，不难发现：前期当统治阶层尚有执政的权威性时，自身没有动力与能力去引导一场真正的改革，当面临深刻的危机与挫折而不得不进行改革时，却由于战争失败与无能而丧失了了在臣民中的统治正当性，从而也无法进行改革。这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两难矛盾。

“如果从关键节点看，鸦片战争后，清朝国门被打开，但是政府却没有立刻行动起来，白白浪费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温和的改革派开始了洋务运动；随后甲午战争战败，洋务运动失败，激进的改革派进入权力中心，开始戊戌变法；而戊戌变法事后被严复视为‘庸医杀人、书生误国’；戊戌变法后，保守派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严加取缔，又形成一种反向运动，进而导致庚子事变与之后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对于清朝是‘巨大的转折’，从那以后允许外国驻军，其埋下的隐患甚至一直延续到日军后来的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百姓流离失所。



执政数百年的清王朝，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气数耗尽。哪怕清廷在末期推出了新政，然而由于其已经陷入了权威危机，使得排满主义压倒了清王朝的改革。清王朝，终归走向无法避免的灭亡。

“历史的责任”

《辛丑条约》签订120年后，当辛丑年再度到来时，如今中国人民见证的是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早已和昔日形成了巨大反差。同样是辛丑年，202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克雷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对话现场，杨洁篪阐明态度：美国没资格居高临下对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在这样的改变背后，不仅仅是简单的时光流转，更是历史长河中先辈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

因此，接受《新民周刊》采访过程中，萧功秦多次提及当下的国人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清王朝的灭亡与悲剧的中国近代史。对于义和团运动，他曾如此评价：今天作为义和团的后代，没有任何权利去嘲笑、指斥自己的祖辈——那些时代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人们在捍卫民族尊严时所采取的斗争形式。因为如果今天的人们诞生在那个时代，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或许也很少有人能够避免那种迂腐、荒谬与保守。同时，他也对本刊表示，义和团运动过程中那种非理性的、狂热的排外情绪在不同历史时期同样值得警惕。

从这一层面上来看，盲目的吹捧与肤浅的斥责，都是放弃了历史赋予当代人的责任。

此外，萧功秦指出，如果将清朝灭亡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联系起来，就能够看出：当多元文明的常态与强势政府结合在一起时，才会产生强大的生产动力。

在他看来，“强势政府”在今天指的是国家拥有足够的实现意志与既定战略目标的能力，而民族的创造力与竞争活力，自然离不开多元文化。这二者是过去清朝的弱势政府所不具备的，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

“我们欣慰地看到自身摆脱了过去的困境的同时，更应当明白：只有当我们从历史当中汲取各种教训，才能在如今国家现代化的坦途当中，越走越稳健。”